

革命回忆录

(四)

人民出版社

革命回忆录

(四)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20,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11001·482 定价0.42元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些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尽详实之处。如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对蔡和森、向警予同志的回忆片断·····	施益生 (1)
桑鹤岁月·····	蹇先任 (12)
红九军团护送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涂通今 (91)
徐帅在东阳关前指挥的一次“示范”战·····	李志宽 (106)
跟随贺龙师长当小鬼·····	王新政 (111)
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	吕振羽 遗作 (116)
缅怀吕振羽同志·····	岳 夏 (127)
回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的 几次讲话·····	朱语今 (139)
随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南京进行谈判·····	童陆生 (145)
海上英雄程远超和崆峒岛胜利·····	常 勇 (154)
原武汉军校部分女战士纪念恽代英同志 座谈摘要 ·····	(162)

对蔡和森、向警予同志的 回忆片断

施益生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我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城外比央古地区的雷诺大汽车工厂工作。一九二四年二月，周恩来同志把我带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和下列同志认识：李富春、蔡畅、邓希贤（回国后改名邓小平）、李畅英、刘伯庄、穆青。这时我才知道，向警予同志是蔡和森同志的战友和伴侣，蔡畅同志是蔡和森同志的妹妹，她和李富春同志是又一对革命战友和伴侣，他们四位原来是一个革命家庭的成员。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李富春、蔡畅同志经莫斯科回国。他们回国前，我请他们到巴黎一个饭馆吃饭，三人并合影了一张照片留念。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日我因参加反帝运动被法国政府逮捕入狱。法国警察把我们合影的照片没收了，但有一张收藏在我的皮箱衣袋里，没有被法警发现。这张未被抄走的相片，后来有了特殊的用途。我坐牢一个多月后，被法国政府于十月十八日驱逐出境。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趁此机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时，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是傅钟同志，支部委员是邓小平、刘明俨同志。我被捕时，我的中

国护照被没收。因此，旅欧支部委托李毓楷同志替我向中国驻法领事馆办理新护照，为此必须找到我的半身照片。于是，李毓楷同志到我住过的房间内，打开我的大箱子，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这张三人合影的照片，剪下了我的半身像，解决了问题。

我还没有出狱，李毓楷同志就受旅欧总支部的委托，把下列文件亲自送到“桑德”大狱，交我接收：一、中华民国护照一份，上面写明取道莫斯科回国。二、中共旅欧总支部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同志的介绍信一封，其中证明我是一九二四年在巴黎入党，正式党员，一九二五年九月因参加反帝运动被捕入狱，十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旅欧总支部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请接转党的关系。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我到达莫斯科，进了东方大学。刘伯坚同志亲自出来接我，他早已收到旅欧总支部的通知，正在等候我。他立刻为我办理了入学手续和转党关系手续，作了住宿和其它生活上的安排。这个时候，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共有百余学生。所有中共正式党员一律被转为苏共候补党员，我也包括在内。中国班又分为中文听讲班和法文听讲班。我被编入中文听讲班，同学约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有：施益生（班长）、向警予（女）、罗世文、刘昆（即赵毅敏）、蔡振德、陈醒华、童庸生、邹进贤、吴先清（女）、张士强（女）、朗明钦（女）、侯玉兰（女）、杨子烈（女）、李一纯、王同根、王同荣、徐褐夫、沈尚平、黄宝英、郭肇唐等。我们的学习课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共党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职工运动、社会形式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俄文等。各门课程由老师用俄语讲授，翻

译译成中文，讲一段，译一段，同学笔记下来，晚上加以整理。我们班的译员是曾涌泉、王人达、武止戈、宗孚。

向警予同志在我班上经常起带头作用。她辛勤温习，积极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那门课程的题目，她都心中有数，有她独特、深刻的见解，从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特别对于一切原则性的问题，她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毫不妥协，敢于坚持原则；同时她又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原理，进行分析、推断，以理服人，使大家感觉到她确有道理，确实掌握了革命真理的说服力。例如，马列主义关于采用暴力革命，才能打破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学说，关于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保证自己的领导权的问题等等，向警予同志当年的雄辩陈词，至今犹令人神往。

向警予同志身体不很健康。每逢有病，都由我陪她去医院，当她的翻译。当时，我的俄语还不行，但苏联大夫一般都说德语。有两次向警予病重，必须住院，也是我送她到医院，几乎每天都给她送去她所喜欢吃的东西。出院时我又替她去办出院手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向警予同志即使在重病中，也从不出呻吟叫苦，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也受到了感染。

蔡和森同志是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与李立三、向警予等同来莫斯科的，他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除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之外，还非常关心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学习情况。按照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推荐和中共东大旅莫支部刘伯坚同志的邀请，他和李立三同志分别为我们中国班作了几次重要报告。在李立三同志讲了中

国职工运动发展史之后，蔡和森同志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他的报告对我党不长的然而丰富多采的历史，作了科学的总结。他分析了我党产生的历史背景，考察了党在中国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中的斗争历史，捍卫了党的正确路线，精辟地批判了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各种错误政治思想倾向，同时他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明确指出了摆在我党面前的问题和任务。和森同志的报告，对于我们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对于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革命的最新经验，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弄通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学习蔡和森同志的报告，我们班的同学对照整理了大家的笔记，并油印出来，订成小册子。我作为班长，带着这本小册子到中共代表团所住的旅馆，把它送给蔡和森同志校阅。他对我们所作的整理表示非常高兴，没有提出意见。于是，我们就大胆地把这本小册子散发了。也许这就是蔡和森同志党史报告的唯一原始版本。我所能引以为慰的就是，这样一种简陋的出版、发行技术，居然能把蔡和森同志当年闪烁着马列主义理论光辉的重要报告，经过六十余年的曲折革命历程，终于传递到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读者手里。

一九二六年底，由于国内革命高潮的要求，东方大学中国班大部分同志被调回中国工作，包括向警予同志在内。只有罗世文、刘昆和我三人留校作译员工作。这时，从国内又调来一大批产业工人党员、团员，以学习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为主，也兼学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另外，也调来一批学习政治

理论的新学员。

一九二八年三月我患了严重的三叉神经痛症，头脑左右两部有如针刺一样地痛，直接牵连到腹部和两足的神经系统，而且全部牙齿动摇流血，崩坏无余。我变成了一个半残废的人。东方大学门诊部把我送到医院，采用电疗法治疗，先在莫斯科，后在南俄黑海岸耶夫巴多利亚和雅尔塔诊治。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我从南俄疗养院回到莫斯科东大，已是一九二八年九月。这时东方大学中国班已全部合并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只有我由于外出治病没有列入归并名单，还是东方大学的翻译。我回来时，三叉神经痛尚未彻底好转，还要继续电疗。这时，周恩来、邓颖超、刘伯坚三位代表尚未回国，他们亲自到东方大学宿舍来看我。我在感动的激情之下，请他们在东大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还请邓颖超、刘伯坚两位看了一次马戏。周恩来同志见我还需继续治疗，叫我把病况写一份书面材料，送他处理。当我把这份材料送到旅馆给周恩来同志看时，王明进来了。他当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同志就问他：“一个月以前我请你准备好一张疗养证，到底准备好了没有？”王明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批评他说：“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你搞了一个多月之久，还没办好，到底你在干什么？”王明面红耳赤，嘴里唯唯诺诺地退出去了。于是，周恩来同志在我的书面材料上作了下列批语——东方大学校长：施益生同志身患重病，三叉神经痛，还需留校继续治疗。拟请将他取录入东大研究部作为研究生，以便从容治病，早日恢复健康，回国工作。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根据周恩来同志这一批

语，东方大学校长舒麦斯基把我编入了东方大学研究部的列宁主义研究班。十月间我得到五名苏共党员的介绍，经苏共东大全体党员大会通过，由候补党员转为苏共正式党员。

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二九年五月，我只是一个挂名研究生，每天都到电疗医院烤电。六月，东大门诊部又函请苏共中央医疗委员会，把我送到苏联中部地区库尔斯克省的马林诺疗养院。这是苏联中央政府直属的疗养院，各方面条件都好。我治疗至八月初，病有好转时即回东大。门诊部主任马寅士又把我送到东方大学本身的城外休养所。有一次，我躺在休养所前小河边的草地上晒太阳，偶然抬头一望，看见了在巴黎一道工作过的三位老战友：傅钟、邓希贤和李俊哲（即李卓然）。他们迎面走来，使我一阵惊喜，急忙跳起来，赶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手。原来他们正在孙中山大学的休养所休养，离东大休养所不远。可惜叙谈不长，彼此寒暄几句，我们就告别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同志从国内来莫斯科治病。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受了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打击而来的。当时，他患着极其严重的哮喘病，呼吸非常困难，晚上也无法睡眠。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古久莫夫指定我当他的翻译，照顾他的生活，陪他去莫斯科中央医院看病和治疗。到十一月底，蔡和森病况没有好转。古久莫夫断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从苏共中央医疗委员会为他要来了一张北高加索地区基士洛夫茨克市的疗养证。从莫斯科到这里要搭火车三日三夜，车上又没有任何医疗人员和设施。他们就要我陪着蔡和森同志同行，进行护理和照顾。那

时，我的三叉神经症还没有好，东方大学又从苏共中央医疗委员会给我也要来一张疗养证。我当时确是稀里糊涂，根本没想到这种旅行会给蔡和森同志带来多大的危险，也没有想到我自己这个病号会背上了多大的政治责任。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前，蔡和森同志告诉我，必须去看看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天晚上七点左右，我陪他到了孙中山大学米夫的家里。当时米夫兼任孙大校长，住在孙大宿舍。他和他的夫人布拉格尔夫接待我们，还拿出来当时比较稀少的白面包、香肠、糖果等等招待。米夫首先询问了蔡和森同志的病况，和森同志如实地作了回答。随后，米夫又问及中国情况，特别是国民党黄色工会在职工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和陈公博改组派的活动。和森同志哮喘越来越厉害，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多说话，只简单地拚命挤出了几句回答。我翻译完了他的答话之后，把他近几个月的病情又向米夫报告了一番。米夫看到蔡和森实在无法继续谈话，就不再问了，但对他即将长途跋涉，去南方疗养，也没有作任何表态或建议。九点左右，我陪蔡和森同志离开孙大，送他回到共产国际的旅馆“柳克斯”。

过了两天，我陪蔡和森同志搭火车前往高加索。车行两日两夜到了高加索北麓。这里天气非常干燥，昼夜温差较大。疗养城基士洛沃茨克位于整个矿泉区的最南部，我们的火车几乎要爬到高加索主岭附近才能到达。随着火车上山，和森同志的病情越来越恶化，开始他还张开大口，使劲呼吸，后来，时间越拖，越来越没力气，手指、脸色明显青肿，哮喘声音都听不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哮喘病人，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简直

狼狈不堪，慌了手脚，还不知道究竟怎么办好。最后，只好按照列车员的建议，在一个小车站临时停车，背着他往附近的小医院跑去。这时约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小医院一个值班护士在打瞌睡。我苦苦哀求，请他马上去找大夫来急救。最后，来了两位大夫，紧急商量了一阵抢救方法。他们给蔡和森同志打了好几针，灌了些药水。又经过四、五小时提心吊胆的护理、急救，和森同志才逐渐恢复了正常呼吸，闯过了前高加索的鬼门关。第二天中午，另一列车来到，我才陪他上车，继续这条苦难的里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我们到了基士洛沃茨克，进了斯大林疗养院。这儿是高加索主岭下的一块小高原，周围石山耸峙，气压偏低，空气干燥、日夜气温相差较大，似乎很少哮喘病人来此疗养，来的多是肠胃病人等等。蔡和森同志历尽路途艰险，居住在这里感觉很不适应。治疗几天之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病情有所加剧。我感到情况不妙，就和他商量马上离开此地。我虽然对医疗学问毫无研究，对哮喘病尤其不通，但我觉得，六、七月间我曾住过的马林诺中央疗养院，地处俄罗斯中部，气候温和，空气新鲜，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肯定要比这里强。蔡和森同志表示了对我的高度政治信任，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马上越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直接给苏共中央医疗委员会打电报，通知蔡和森同志病情的剧烈恶化，告诉他们我们即日离开此地，径自搭车前去马林诺中央疗养院，并请他们通知该院予以接收。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所能想出和做到的唯一一招。想不到也就是这一招终于解决了蔡和森同志所处的险境。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我陪同蔡和森同志到达马林诺中央疗养院。这里早已收到了苏共中央医疗委员会的电报通知，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总医师索洛金亲自检查和诊断了蔡和森同志的病，采取了多方面的综合治疗方法，开了许多处方。对我的病，他也表示了同样的关怀。结果，我们二人的病情日益好转，健康逐渐恢复。蔡和森同志不再哮喘了，每天能看书报，又慢慢地谈笑风生了。

蔡和森同志实在太好学了，病刚好一点，就要看俄文版的斯大林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因为这时找不到译本。对这本书他真是爱不释手，临寝前还要细阅一阵。对俄文上的疑难，他毫无忌讳，非找我和他一道，把每段每句的真实意义和曲折语气彻底弄通不可。有时候，使我想到，他是不满意当时所看到的中文译本，而是想直接了解斯大林的原著。

这时，苏联科学院已经开始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真理报》经常刊载批判文章。蔡和森同志对苏联哲学界的动向异常注意。他要我把这些批判文章的要点口头译给他听。德波林当时（一九二九——一九三〇）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杂志的主编，发表了许多散布唯心主义的谬论，其要点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主义阶段；把哲学与实践与政治分割开来；企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极力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辩护，等等。蔡和森同志马上就意识到了苏联哲学战线上这场路线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德波林派的唯心论如果不加以批判，势必助长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滋生，对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都会有害处。后来我读到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看到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我不禁自然地想起，蔡和森同志真不愧是毛泽东同志志同道合、根基一致的亲密战友。

马林诺疗养院前有一个天然湖，湖边一片大森林，空气清新新鲜。我经常陪着蔡和森同志在森林中散步。在森林中休息时，他曾多次向我讲述他参加过的一些革命斗争的经历，使我有幸受到活生生的革命教育。就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在马林诺中央疗养院很快地度过了两个多月。一九三〇年三月中旬，蔡和森同志基本恢复健康，可以参加工作了。于是，我就陪他搭车回到莫斯科。他仍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和瞿秋白同志一起。我又回到东方大学研究生部。

回莫斯科以后蔡和森同志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他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大学研究部作为藏书。他还应莫斯科国际土地问题研究院的邀请，充当了该院的顾问，负责给该院做了些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村阶级关系的报告。他把我拉过去，做他的助手，帮他收集资料。我现在还记得他在该院所做的两次报告。这两次都是我当俄文翻译。听众有土地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包括一些外籍研究人员；该院院长杜布罗夫斯基也亲自参加。

我特别清楚地记住了蔡和森同志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明确观点：坚决断定，中国农村中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广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坚决相信，中国的中农也受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

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政治上也受压迫,因此,他们不但能够参加反帝斗争和土地革命,而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同时要认清,中国富农与地主有区别,一般说,富农在农民的反帝斗争中可以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中可以保持中立。因此,不应当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阶级,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团结中农,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以完成民族民主的革命任务,并保证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这里令我特别钦佩的是,在当时苏联提出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作为阶级(这当然是对的)的时候,共产国际东方部也刮起了一阵强调斗争中国富农的左倾风。后来我知道了,蔡和森同志这次受打击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其中也包括对富农的政策。然而,不管他自己在国内国外受到了多大的打击,即使是从我们党内和共产国际来的打击,他也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是很值得学习的。

一九八一、四、一定稿

桑 鹤 岁 月

蹇 先 任

湘西桑植、鄂西鹤峰，是我党早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一九二八年三月，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同志遵循党的指示，和周逸群等同志返回湘西北洪家关，联络亲友、旧部三千余人，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创建了工农武装。以后，这支队伍几经周折，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红四军（改为红二军后又改为红三军），根据地也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日益扩大。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红四军离开湘西东征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外有强敌反复侵扰，内有少数红军领导人叛变和左倾错误的干扰。这样一来，致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后，湘西根据地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我从一九二九年夏在湘西参加红军以后，一直没有离开湘西，在这里坚持了五年多的斗争，渡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个人当时所处的不同环境，我这段经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可从侧面反映湘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真实情况。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湘西革命斗争的特点，我把它讲出来，

供研究者参考，并以此缅怀在斗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

锅 几 台 之 行

一九三〇年春，当山茶树吐绿的时候，红四军根据上级的命令，就要离开湘西东征了。这时，我在红四军前委做文书工作。因为有身孕随军行动不便，组织上让我留在湘西休养。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旦离开部队，就要离开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同志们，从感情上来说，有些难舍难分。但是，如果随军东征，身体又吃不消。由于妊娠反应，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再说，今后分娩，问题更多，势必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不少麻烦。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下决心留下来。到哪里去呢？我想到了贺香姑大姐。

贺香姑，又名贺民英、贺英，她是贺龙同志的大姐。她的丈夫叫谷绩廷，又名谷虎，是哥老会的龙头大哥，自称“打富济贫”。他结权势，打冤家，拖枪拉队，自立山头。后来，他被“湘西王”即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委任为“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贺英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善骑能武，能说会道，擅长交际，帮助丈夫经营。谷虎贪佞残暴，被冤家对头刺死后，贺英接替谷虎所任“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之职，是袍哥会里人人敬畏的风头大姐。一九二八年三月，贺龙同志返回湘西北洪家关，重建革命武装时，贺英出于手足之谊，虽未亲自带领人枪参加红军，但她分出二十多条长枪和三十余人给红军，留下十几只驳壳枪防身自卫。同时，她还向族人派款捐物，转交贺龙、周逸群同志，作为建军经费。